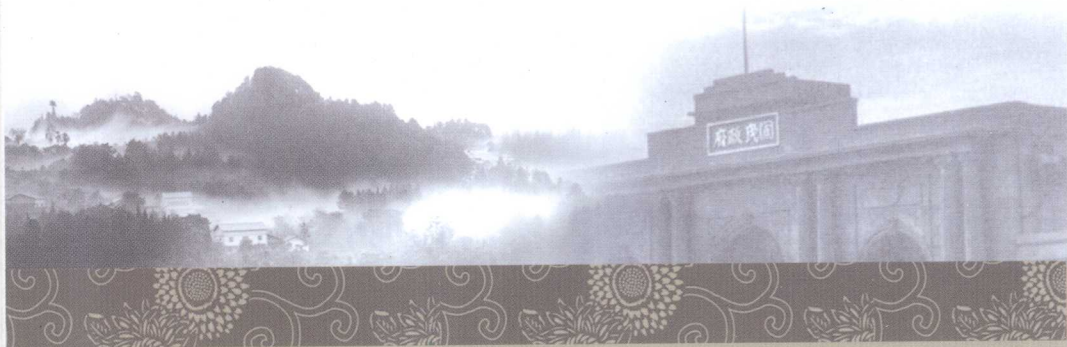


文学南京

——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文学生态

张勇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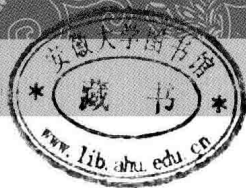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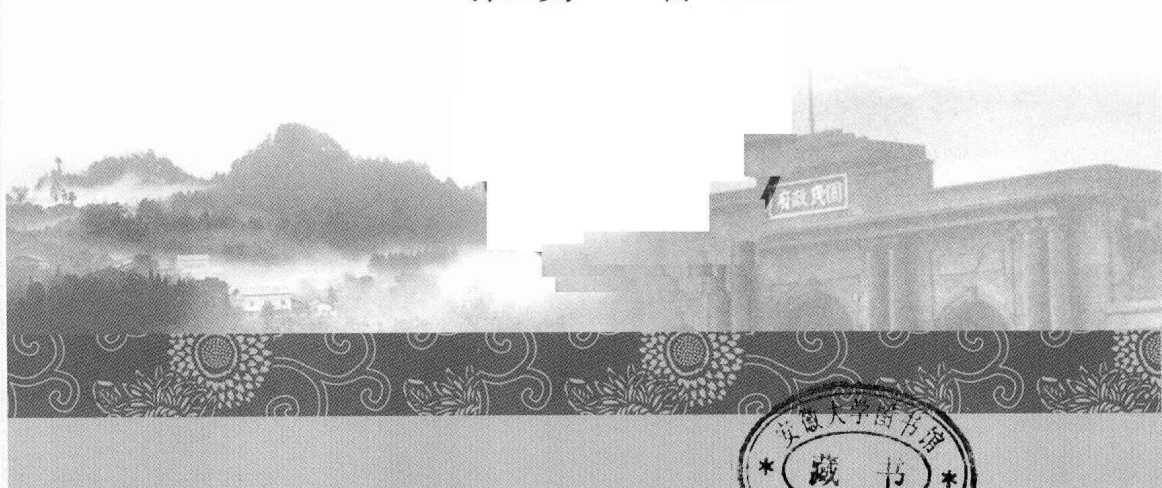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学南京

——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文学生态

张勇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南京：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文学生态 / 张勇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
ISBN 978 - 7 - 5161 - 2262 - 4

I. ①文… II. ①张… III. ①文学研究 - 南京市 - 20 世纪
IV. ①I209.9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571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51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民国时期南京文化保守主义传统	(10)
第一节 南京文化保守主义的传统底蕴	(13)
一 绵延的国粹思潮	(15)
二 南社的余绪	(21)
三 国学研究会与《国学丛刊》	(28)
第二节 西方文化保守主义观念的引入	(33)
一 西学对于复古派的影响	(33)
二 《学衡》与新人文主义精神	(36)
第三节 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的关联	(47)
一 民族主义思想倾向	(48)
二 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的差异	(50)
第二章 民国时期南京的校园文学社团与传媒	(57)
第一节 南京校园文化变迁与社团、传媒的变革	(59)
一 南京高等师范 - 东南大学 - 中央大学的社团及刊物	(62)
二 金陵大学的社团与媒体	(80)
三 辐射于校园之间的社团及刊物	(89)
第二节 教育变革引起的新旧文学并存与冲突	(95)
一 新旧文学的并存	(97)
二 国语运动带来的新旧文学观念的论争	(120)
三 关于诗歌审美标准的论争	(134)
第三章 民国时期南京的政治文学社团与传媒	(148)
第一节 二三十年代政治影响下的南京报纸	(151)

一 官方报纸	(154)
二 民办报纸	(159)
三 报纸副刊	(164)
第二节 南京的政治文学社团与刊物	(166)
一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社团及刊物	(169)
二 国民党右翼党派文学社团及媒体	(177)
第四章 文学南京的独特性	(186)
第一节 南京城市文化传统的独特性	(188)
一 作为政治中心的南京	(189)
二 作为教育文化中心的南京	(192)
第二节 新旧文学作品中的南京形象	(196)
第三节 南京文学与“京派”、“海派”之间的差异	(217)
一 南京文学与“京派”的异同	(219)
二 南京文学与“海派”的异同	(224)
结论	(231)
参考文献	(233)
后记	(248)

绪 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方掀起了城市文学研究的热潮，这表明学者们试图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局限，寻找历史和文学更为生动具体的对象。中外学者以本民族当代或历史上的城市文学或文学中的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城市与文学的相互关系。Richard Lehan在《文学中的城市》一书里（Richard Lehan, *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明确提出：“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概念，认为欧美城市不同发展阶段文学的表现方式，“对高度发展和机构复杂的城市的逃避和拒斥，构成了现代主义（印象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的源泉。现代主义转而表现城市压力的主观印象和内心现实。”^①在“文学中的城市”这一命题的研究中，西方学者惯于联系作者的城市生活经验与文学文本中经过创作而构成的生活图景进行分析，在个人的城市经验转化为文本的过程中，作者的独特想象不可或缺。

以中国城市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早期从地域文化角度分类论述，90年代后往往以都市文化为着眼点，运用想象性城市叙述理论来进行评析。如美籍华裔学者张英进的《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和性别的结构》（Yingjing Zhang, *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Configurations of Space, Time, and Gender*,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6）。赵稀方的《小说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着重探索了文学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将香港的文学文本叙述分为三类：英国人的殖民叙述、大陆的国族叙述以及香港人的香港叙

^① 参见季剑青《体例与方法——读〈文学中的城市〉》，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5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述。黎湘萍的《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以知识者的视角，采取个案研究方式，梳理和探讨了台湾文学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王德威的《如此繁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则以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四座城市的历史脉络、城市与作家的紧密互动为主题，描述了文学中的都市背后所隐含的丰富想象。近年来国内城市文学的研究集中在香港、台北、北京和上海这四大城市^①，尤以上海和北京为热点，已出版的专著如赵园的《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着力于给“文学中的北京”定位，认为北京是文人的精神故乡。该书集中分析“京味”风格的文学作品，保留着城市文学形态研究的痕迹。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是区域文化丛书中的一种，试图描述上海洋场中的海派文学特征，书中上海作为文学产生的背景而存在，并没有深入探讨城市与文学之间的互动。许道明的《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和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则开始重视上海的都市文学的独特性。自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出版后，我们看到了更加丰富的文学城市形象，既包括物质城市的变迁，又重视文学对城市变革的反映，以及文学自身伴随城市发展历程的不断演进。这本书运用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观念，引入“文化研究”和“新文化史”的方法，在“文化想象”的基础上建构了上海的特殊形态。李欧梵认定上海三四十年代的都市性正是中国国家现代性的一种，借用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理论，对印刷文化、媒介文化的生产、消费、传播以及再生产进行描述，并特别以刊物、电影、流行生活为主要表现领域，叙述城市对现代性的共同心理认同，从而剖析出上海城市现代性的特质。吴福辉先生近来的研究，如论文《小报世界中的日常上海》、《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也带有类似特征。叶中强的《从想象到现场：都市文化的社会生态研究》（学林出版社，2005）将上海的文学视为被政治化、格式化的文学，是市民文化的展现。陈惠芬的《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20世纪

^① 参见罗岗《想象城市的方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90年代“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从90年代对“文学上海”的四种想象模式入手,阐述上海城市文化身份的内涵,将文学中的上海与文化意义中的上海结合起来。陈平原最早有意识地以想象性理论研究北京文学。2005年10月,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中文系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联合主办“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集为《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陈平原以“文学中的城市”为切入点,“谈论中国的‘都市文学’,学界一般倾向于从20世纪说起,可假如着眼点是‘文学中的都市’,则又当别论”。谈到“文学中的北京”这一概念时,陈平原用“想象”一词去表述。在《“五方杂处”说北京》一文中,陈平原说:“略微了解北京作为都市研究的各个侧面,最后还是希望落实在‘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上。……因此,阅读历代关于北京的诗文,乃是借文学想象建构都市历史的一种有效手段。”^①这表明文学与城市的关系,不仅包括经验,还应包括思潮、文体、传播与受众阅读等因素。城市的历史形态和城市文学文本之间便构成了非对应的极其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对城市的不同表述中。从“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角度研究北京与北京文学、上海及上海文学时,我们发现作为现代都市人,我们往往更注意当下城市所呈现的状态,而忽略城市历史。梳理城市与文学的关系,就是将历史内涵与当下状态结合起来分析,从而给文学一个完整的背景,为城市作一个完美的叙述。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城市认同,能够给城市的文化认同和身份建构拓展出新的空间;而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也是文学发展、创新的新契机。在想象城市的文学叙述中,南京似乎是被文学遗忘的角落,以民国时期的南京及南京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论著至今还未看到。

南京是江南重要而特殊的城市。江南是清末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拥有一个完整的城市发展体系,许多原本只有百户人家的小市镇发展为拥有超过百万居民的大城市,如上海、苏州等。南京则不属此

^① 陈平原:《作为文学想象的北京——“五方杂处”说北京之五》,《北京观察》2004年第5期。

列，作为六朝古都，早在王朝国家时期南京就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而发展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正如朱偰所说：“其地居全国东南，当长江下游，北控中原，南制闽粤，西扼巴蜀，东临吴越；居长江流域之沃野，控沿海七省之腰膂；所谓‘龙蟠虎踞’，‘负山带江’是也。论者每谓金陵形势，偏于东南，都其地者，往往谓南北对峙之局，不足以控制全国，统一宇内。故三山驻师，终鼎足割据之势。五马渡江，开南朝偏安之局。实则金陵一隅，实中国民族思想之策源地。金陵之于中国，……虽未必尽为全国中心，然有事之秋，登高一呼，天下响应。”^①在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东移、南迁的历史过程中，南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南朝文学理论的创建到唐诗的黄金时代，南京都参与其中。“中国很少有地方在文学掌故的深度上能超过南京。”^②明朝，南京作为初期都城，一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形成了攻守兼备的城市形态；另一方面以集权中心的形式加强了自身的政治色彩，聚集了大量文化精英，使南京成为多职能的城市：行政中心、经济中心、军事要地。明代中晚期南京成为全国的文学中心。现当代文学中对于南京的描述偏向于城市文化、城市建筑和城市历史，缺乏对于南京文学的整体描述和“文学中的南京”的总结，没有构建出完整的“文学南京”。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关于南京城市文化、文学的文集和选集有：《南京史话》（蒋赞初，南京出版社，1995），《老南京》（叶兆言，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老南京写照》（王娟、张遇主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江城子——名人笔下的老南京》（丁帆选编，北京出版社，1999），《斜阳旧影》（庄锡华，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家住六朝烟水间——南京》（薛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黄裳说南京》（黄裳，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金陵十记》（杨心佛，古吴轩出版社，2003），《江苏旧影往事：杏花烟雨》（王晓华，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民国南京 1927—1949》（秦风主编，文汇出版社，2005），《风生白下——南京人文笔记》（诸荣会，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① 朱偰：《自序》，载《金陵古迹图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

② 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载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8页。

2005),《旧时燕——一座城市的传奇》(程章灿,凤凰出版社,2006)等。此外还有以现代南京城市文化为着眼点的文集,如《城市批评·南京卷》(王干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读城记》(易中天,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等。这些资料一部分是90年代以来怀旧风潮的产物,一部分是传统南京文献的重新整理。通过它们,我们大略可知民国时期的南京城市风貌,尤其是南京的传统风俗、历史遗迹和文化特质,但民国时期南京的文学没有得到完整展示和系统整理,其独特属性和文学价值尚有待进一步认识。

民国时期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以政治中心的地位聚集了众多文化精英,形成文学上的繁荣局面。在文学与城市的关系中,“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够备受文学家关注而形成一整套与之相关的文学话语。必须是那些具有政治文化意义的城市抓住了作家和人们的注意力,变成了文学中的形象,甚至深化。文学对他们的神话和话语化不断赋予实体城市以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①。对于因政治军事因素建城并一直占据重要政治地位的南京来说,政治文化意义促使南京成为古今文学中的主题,“尝以为中国古都,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文物制度,照耀千古者,长安、洛阳而外,厥推金陵。北京虽为辽、金以来帝王之都,然史迹不过千年,非若金陵建都之远在南北朝以前也。他若汴京、临安,一开都于五代,继于北宋;一肇建于吴越,偏安于南宋,其为时较短,而历史遗迹,亦不若长安、洛阳、金陵、北京之众。而此四都之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为金陵为最”^②。

20世纪20年代初,南京的文学笼罩在文化保守主义的传统之下,以古典文学为基础,试图融合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的精粹,形成艺术价值较高的文学作品,驳斥新文学中浮泛虚夸的成分,树立与新文化阵营截然不同的温厚广博的文学规范。这一时期南京文学的主要社团和成员以大学校园为活动场所,新旧文学阵营共同进行文学活动。北伐战争以

^① 陈晓兰:《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② 朱偰:《自序》,载《金陵古迹图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

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南移，1927年4月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南京文学分化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弘扬文化保守主义传统，不断加强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研究；一部分不完全赞同国民政府的政治主张，形成评论干预时事的公共领域；另一部分则将文学视为政治的宣传工具，作品在题材选择上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还隐含着政治权力运作机制及政治行为，广泛涉及不同的党群利益和个人的政治意图。

南京的悠久历史促使其形成文化保守主义传统。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是在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力图维护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一种社会思潮。南京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是在中西文化都出现了严重危机的背景下活跃起来的。它一方面在维护传统的基础上反省传统，一方面在批判西方的前提下学习西方，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为本位，融汇调和西方文化，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系统。这种传统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国粹派”、南社、国学研究会和“学衡派”都致力于恢复儒家学说在中国现代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则是对于传统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的继承与发展。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理念交融并进，形成了不成体系却有共同指向的文化观念。余英时曾指出：“事实上，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个严格意义的‘保守主义者’，因为没有人建立一种理论，主张保守中国传统不变，并拒绝一切东西方的影响。从所谓中体西用论、中国文化本位论，到全盘西化论、马列主义，基本取向都是‘变’，所不同的仅在‘变’多少，怎样‘变’以及‘变’的速度而已。因此接近全变、速变、暴变一端的是所谓‘激进派’，而接近渐变、缓变一端的则成了‘保守派’。”^① 这大致描摹出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心理趋向。“学衡派”是南京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重要团体，其成员构成比“国粹派”等团体复杂，既有传统文化的忠实卫士，如柳诒徵等；也有留学欧美，以中学为基础博采西方文化精粹的学者，如吴宓、梅光迪等。他们不满意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主张和实践，从西方引进了“新人文主义”与之抗衡。

^① 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载《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图书馆1994年版，第38页。

近代体制下，大学与媒体是文化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孵化”文学的两个重要场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革命的深入和民主政治的推行，社会发展迅速，旧知识体系远远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促进知识体系更新，“唯一可托的是大学。大学必须给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教师和学生提供庇护并促进他们的发展，使他们免于现实俗务的纷扰，探索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并努力理解其真谛”。^① 中国传统的“政教合一”的理念导致学统、道统与政统在理论上一致起来，即教育与社会道德标准、官方政治哲学合而为一。辛亥革命以后知识分子纷纷进入大学，他们不仅担负着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吸纳西方先进文明的重任，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基础上还致力于现代文化观念的传播。南京的大学作为民国时期备受偏爱的首都高等学府，教授及学生也往往以“学术权力”对抗“政治权力”，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数次驱赶校长风潮，集中体现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对立。南京的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不仅在政治选择上与政府保持距离，在文学取向上与主流文化也不尽相同。通过大学这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他们集结同人、组成社团、出版刊物、发表言论，在现代传媒技术的支持下，弘扬自身的文学主张。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加剧，对进步文人进行迫害，南京的大学文人社团由于缺乏经费和不堪政府的压制而逐渐消解。国家作为政治实体利用自身的垄断性的力量遏制一切具有离心倾向的力量，设法把它们加以分化、重构乃至消灭；同时国家还通过主流媒体的灌输传播建立起一个封闭的话语体系，并通过动员整个社会捍卫这个话语体系的合法性，通过对这个话语体系内部异己力量的排斥斗争，通过教育体制对这个话语体系的加强和再生产，不断加固自己的中央集权的垄断地位。在国家的强大控制力量下，大学虽是现代文明的传播地，也不免因政治的侵入而沦为官方控制下的教育机构，“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口号从民国初年提出，却一直没能实现。

现代传媒打破了封建正统文化的垄断地位，推动了现代文化的普及，突破了传统精英文化独霸的局面，使大众文化得以进入主流并形成

^① Flexner · Abraham.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 转引自刘宝存《大学理念的传统与变革》，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独立于官方之外的传媒话语权，改变了文化传播的形式，扩大了受众群体和社会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接受传播的权利，拓展了人们的认知空间，促成了新的价值系统的形成；同时也为社会变革确立了有效的社会价值评判，改变了民众的集体行为方式，吸引了广大民众对先进势力倡导的变革运动给予关注并产生反响，形成文化集团对社会的制衡力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的大学校园文化影响下出版的刊物为传媒先进性的代表。无论《学衡》还是《国风》都突破了新文学阵营建立的文学范式，在文化保守主义理念的指导下创立了新旧结合的文学形态。这些刊物不是国民政府的宣传工具，以相对独立的姿态发挥着自身的文化影响。二三十年代大众传媒中既有极力保持独立品格，尊重事实的政府异见群体；也有依附于政治势力之上为虎作伥，充当主流政治文化的传声筒，协助当权者散布流言、攻击进步团体、麻醉迷惑群众的媒体。这一时期南京文学内部的斗争是代表着保守政治集团和新兴政治势力各自利益的文学家之间的斗争，斗争的前提在于主流文化是双方共同默认的基本准则。这种默认乃是文学家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是当权政治集团为文学制定的基本规范。在前现代社会，文学被主流文化所控制，被改造为可利用的文化资本，诱使政治集团之外的文人自愿与政治力量合谋。这一现象集中体现在30年代的南京右翼文学团体中，团体成员多数为国民党党员，在政府中有固定职务，文学是他们用来阐发或攻击其他政治集团的工具，文学团体也就是他们与其他政治势力争夺文学话语权以传达自身政治意愿的媒介。为了与左翼文学阵营相抗衡，国民党大力创建“三民主义文学”，发起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组织“开展文艺社”、“矛盾社”，国民党右翼党派社团如“中国文艺社”、“流露社”等，试图建立与政治方略相适应的文化统治。民族主义文学、右翼党派文学社团及媒体文学理念僵化，文学创作实绩缺乏，不符合时代潮流，对文学并没有构成深刻影响，充其量是30年代文坛上苍白空洞的话语。

以“文学南京”为题，一方面是由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京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既没有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如上海，也摆脱了传统社会中以政治职能为主的首都形象如北京。南京文学展现出独特的风貌：一方面既不同于“京派”的精英化、官气，也不同于“海派”的商业化、世俗气；另一方面则由于南京文化是多种地域文化的融合

体，既有江淮文化的大气，又有吴越文化的温婉。南京强大的文化包容力，促使南京文学形态多元化，新旧文化理念并存，成为南北文化之间的过渡。虽然民国时期政治分裂，首都南京的政治影响力局限在长江中下游，其发展完全依赖于政治地位，以至于被称为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池”^①。但作为文化中心的南京，既有传统文化的辉煌印记，又中和了新文化的积极开拓，从“昔日荒凉的古城”逐渐演变为“日渐繁华的都市”。^②这既是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过程，也是吸纳西方文明的过程，是理性对待中西文化的过程。南京的文学不是“京派”那种建立在封建帝都基础上，与官方密切相连，带有精英文化色彩的文学形态，也不是“海派”那样带有殖民色彩的现代都市中发展出来的世俗的商业文学。南京文学兼具二者长处，而无二者的极端，既在文化保守主义传统的笼罩下坚持了文学自身独立的品格，如二三十年代的传统文学创作和研究，又因首都的政治中心地位而出现右翼党派文学；既有适应市场要求的文学调整，如南京的各类型媒体以读者的爱好为报刊编辑指向，又不流俗、不趋世，不放弃文学的独立价值，当读者的审美取向与编者的文学观完全不同时，他们舍市场效益而存文学理念，如《学衡》为了宣传自身的学术理念宁可惨淡维持。“文学南京”不仅是对南京的文学风貌的描述，也是对南京这座城市历史、传统文化的综合记述，是对民国时期都市文学研究的重要补充。文中的时间范围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际起止时间应为1920—1937年。自1920年起南京文学开始出现新旧并存、不断论争的局面，教育场域从传统书院发展为现代大学，知识分子在高校和媒体中的活动，彰显出南京文化保守主义传统的特质。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于日寇，政治中心转移，文化力量向西部及海外分散。在日伪政权统治下，大学与传媒仍协助统治者麻痹群众，但这种单一形态和目的的文学是沦陷区具有的殖民地文学，与南京文学的独特性质无关，也与南京文学的历史和发展关联不大，因此不在本书研究的范围内。

① 袁昌英：《再游新都的感想》，载丁帆选编《江城子——名人笔下的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② 方令孺：《南京的骨董迷》，载丁帆选编《江城子——名人笔下的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

第一章 民国时期南京文化 保守主义传统

保守主义是近代以来的重要社会思潮，激进主义者常将保守主义与传统主义相混淆，认为它违背社会发展规律，阻碍时代进步。实质上“根据曼海姆最初的解释，保守主义是作为一种思考‘人与社会’的方法出现的，它重视某些被理性化毁坏了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但又通过一个有效性标准为新近才政治化和理性化的世界提供了实践的方向，因此，它显然和它的对手一样也属于新时代。”^① 保守主义倾向于在文化的延续性中适应新时代。“传统主义行为大多只是反应性行为，而保守主义行为则是具有意义取向的行为，它总是以包含着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总是变化不居的不同客观内容的意义复合体为取向。”^② 在西方，保守主义和它的对立面激进主义是同时并存的，而在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则早在中国文化激进主义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它既是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命脉、挽救传统文化危机的策略，也是对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的抵制和改造。这种思潮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精神的延续，避免了“全盘西化”或狭隘民族主义导致的全盘否定西方文化的两种极端趋势。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说：“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并非一味守旧，而是要维护传统，并在此基础上继往开来。”^③

在中国，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保守主义思潮形成于20世纪初。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应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为代

① [德] 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李朝晖、牟建君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② 同上书，第60页。

③ 汤一介：《论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发展》，载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表。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故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等纷纷聚集于文化保守主义旗下，为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和反对“西化”提出了种种主张，并在哲学、文学、史学、教育等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活动。“在清朝最后十年中，‘国粹’运动在社会各领域产生并发展，它是与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目的在于维系汉族（相对于满族而言）的文化。章太炎把探寻国粹运动引导至学习和宣扬清朝以前的诸子哲学和魏晋文学及佛教上。”^① 儒家伦理道德受到新文化阵营的激烈批判和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的变迁也使之失去了重新普及的可能，导致民族文化危机出现。“由于文化危机所带来的迷茫和消沉而失去认同，不仅是一个民族垂危败落的征兆，而且孕育着国家危机。”^② 同时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中国知识界开始思考西方文化是否存在缺失，“近者欧战发生，自相荼毒，残酷无比，益证……东方高尚之风化，优美之学识，固自有不可灭者”。^③ 该如何借鉴经验教训发展中国文化，“默守旧文化呢，还是将欧洲文化之经过老文章抄一遍再说呢？”^④ 保守主义对此提出了折中的考虑，他们强调文化变动首先应具备历史延续性，始终倾向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或主体的近代文化建设路径，但却并不象传统主义一样在政治上盲目维护传统社会体制，抱残守缺，主张以理性的姿态看待和认同整个社会的近代化趋势。南京文化保守主义传统乃是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理念的一部分，它试图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六朝古都往日辉煌的印记，更是在欧风美雨中保留民族精神的努力。无论是国粹派、“学衡派”还是“国学保存会”，都是趋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群体，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具有一定的选择性，维护的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他们对于传统文化不是一味偏袒，而是有所反思和批判，对自己所维护的那部分传统文化大多依照西方社

① [美] 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② 徐迅：《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③ 《发起亚洲古学会之概况》，《时报》1917年3月5日，转引自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

④ 张君勱：《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第19卷第3号。

会科学学说做过新的附会或诠释，套用冯友兰的说法：他们是“接着”而非“照着”传统文化讲的，其思想内涵和关注指向都是背离封建意识的、建设性的近代文化建设意向。

就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演化的过程来看，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呈现出逐渐减弱的趋势。“现代中国保守主义主要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根本上并不是墨守现行之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许多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多半很清楚那些是该保留下来的文化要素。”^①“在传统文化与学术的总结继承方面，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名家辈出，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拥有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陈寅恪、柳诒徵、钱穆等一大批现代国学大师。毫不夸张地说，在民族文化遗产的研究，特别是推进其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上，较之现代史上的大部分学术思想流派，文化保守主义显然做出了更多的实质性努力。尽管他们的探索未必都成功，他们的文化理论和实践也并不都可取，但对于今日的文化建设，依然是一份有益的启示和可观的思想资源。”^②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另一文化指向是批判西方文化：他们认为西方近代文化是“物质文明”，而“精神不文明”，西方人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进步，但精神世界痛苦甚深，西方近代文化在其演化过程中弊端丛生，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互分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没有得到协调发展。这反映了其保守心态：他们不是为中华民族向西方学习提供有益的借鉴，而是要说明中国固有文化比西方近代文化优越。例如，国粹派对西方议会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认为与西方的议会制度相比，中国古代的任仕制度要公正优越得多。与其学西方的议会制，还不如“复古”。他们对西方近代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没有将西方文化的优势完全抹杀。熊十力曾说：“吾确信中国文化不可亡，但吾国人努力于文化之发扬，亦必吸收西洋现代文化，以增加新的原素，而有所

^① [美] 史华慈：《论保守主义》，《中国近代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3页。

^② 胡逢祥：《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中国近代保守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